

357名官员卷入贪腐“窝案”

今年官员腐败案： 区县政府窝案高发 受贿主要通过节日收礼金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审被判死缓,他落马后牵出铁道部一系列腐败案。近日,刘志军的“左膀右臂”张曙光、苏顺虎均出庭受审,“钱袋子”丁书苗被提起公诉。

曝出腐败窝案的还有中石油。8月26日随着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的落马,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股份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均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除这两起腐败大案尚未审结之外,今年以来媒体已曝光10起腐败窝案,至少357名涉案官员被查办。

记者梳理发现,其中最大窝点129人涉案,最多金额超过2000万元,地方政府窝案涉案人数最多,受贿主要形式是节日期间收受礼金,行贿主要目的是职务调动和升迁。

● 区县政府腐败窝案高发

记者搜集的今年以来的10起贪腐窝案中,共有4名为县处级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占了40%。除了前文提到的甘肃华亭县县委书记任增禄、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之外,还有广东省从化市市长郭清和、广州市白云区区委书记(县处级)谷文耀。

县委书记、县长在我国公务员体系中均属于正处级干部,在公务员序列中处于中层位置。但在县域范围内,县委书记是一把手,特别在组织用人上,县委书记拥有极大的主导权。

记者了解到,华亭县县委书记任增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两起案件主要受贿节点都在县委书记任增禄任内,主要通过春节、中秋、婚丧收取礼金的形式受贿。

在安徽省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案件中,四大领导班子向他行贿的理由是:“为了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而在任增禄案中,129名涉事官员的行贿目的,七成都与职务调动和升迁相关。

● 行业系统勾结犯案明显

在贪腐窝案中,行业系统中勾结犯案现象最为明显。在整理的10起官员落马案件中,有6起案件是落马官员几乎集中在同一行业系统中,涉及扶贫、园林、水利、住建、交通、医药等相关行业。

今年4月,湖南医药监管领域腐败“窝案”案件细节逐渐被披露,涉事11个职能部门,1名厅级4名处级干部涉案,案发前都是医药监管领域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

“窝案”主角系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其他4名涉案人员案发前分别位居省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处长、省物价局药品价格处处长、省卫生厅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省药检所副所长等案件职位。

参与侦办案件的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被查处的人员几乎覆盖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各个环节,因为“大权在握且利益关联”,他们涉嫌相互勾结,“全程”满足药企请托需求。

今年5月份,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纪委调查当地水利系统腐败窝案时,黄岩区原水利系统8名领导班子全军覆没。这是当地某工程事件调查落马的第三套水利系统领导班子,共涉及黄岩区管干部16人,其中正科级7人,副科级9人,还牵出了省水利系统处级干部3名,市管干部1名,市水利系统中层干部1名。

(据新华社)

■ 地方政府窝案涉案人数最多

在10个腐败窝案的媒体公开报道中,涉案人数最多的三名分别是: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66名;广州市白云区区委书记谷文耀案,81名;甘肃华亭县县委书记任增禄案,129名。

今年7月23日,广州市纪委通报称,主要涉及“两违”(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腐败案件,白云区被立案查处的干部由此前的62名上升到81名,其中落马的官员还包括原区委书记谷文耀、原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原副区长吴锦明及早前被“双规”的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

据媒体报道,当时办案的检察官惊诧

■ “窝案”特点

不已:“对于什么行为是受贿,他们几乎没有概念,更不要说拒绝,更没有想过受贿会坐牢。”

10起窝案中涉案人数最少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受贿案,也涉及7人。

■ 官职权力越大涉案规模越大

在10名窝案主犯官员中,有4名是副厅级以上干部,分别是住建部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宇昕、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刘桂生、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邹和平、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记者观察发现,厅官窝案一般比处级官员在涉案规模上更大,所引起的震动更为巨大。

其中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是近年来广州公安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何靖利用其职务便利,在“新车上牌”、“旧车过户”等业务上为黄集洪提供帮助,多次共收受黄集洪人民币60万元。与此同时,黄集洪向其他8名公安人员共行贿1358万元,其中6人属广州交警支队车管所系统,造就了这起广州车管所窝案。

今年5月,北京市司法机关审理证实,住建部市场监管司原副司长刘宇昕在11年间至少牵扯10起受贿,仅个人就非法收受款、物(名表等)折合人民币超过288万元,大部分与建筑企业资质升级有关。

■ 专家评说

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层政府集体腐败说明这些人的权力没有受到班子其他成员的监督,相反班子其他成员还参与到了把手的贪腐行为中。

林喆认为,地方基层政府集体腐败明显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选用干部没有到位,没有严格审查,没有提拔德行好的官员,存在“买官卖官”等行为;第二,监管不力,监督没有到位。

■ 官官相护难查处

“房地产领域、监管领域、交通航空领

域、高等教育、土地建设、工程建设领域都是集体腐败的高发领域。”林喆对记者分析,上述领域国家投资量大,涉及巨额资金、工程款、项目等“油水”。在行业中腐败一个两个容易被发现,大家一起作案就不容易被注意到了。

林喆说,结合以往来看,群体腐败现象总是发生在宗派圈子、裙带关系和官商勾结中,形成了一批人共同作案,并且互相都有利益相关。一旦发现问题,就开始官官相护,由于贪腐群体中每个层面上都有人,就不容易被发现而导致贪腐现象被掩盖。

■ 审计是反腐利器

林喆说,就集体腐败案与中纪委官员有过多次交流,认为现在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集体腐败高发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教育不到位;第二,制度不健全;第三,监督不得力;第四,受腐朽思想的影响。林喆建议,现行整治腐败窝案较有效的方式是审计制度,在审计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力度。“对高发腐败的行业领域加大监管,集中拳头打在一处,一窝一窝落马,小打小闹肯定不行,要大整顿,才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 相关新闻

开发区官员频成“腐败明星”

专家:应健全区务公开 适度分解权力

据报道,当前,开发区腐败案件处于高发态势,往往涉及严重的职务犯罪,窝案串案、大案要案多。专家认为,这与当前开发区园区多、项目大、资金密的特点密切相关,应健全区务公开制度,适度分解权力。

中国法学会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理事会的理事、高级检察官饶力明认为,一方面,开发区党政官员的级别要高于其他行政区域,有的开发区享受的经济审批权限甚至与所在城市是平级;另一方面,开发区普遍机构精简,办事高效,讲究特事特办,有时甚至会“倒着办”。

同时,开发区一般处于城市周边相对隔离的环境,极易形成“独立王国”。“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饶力明认为,园区的土地出让、税费优惠、拆迁补偿等重大事项本应集体决策,但有些园区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园区作为特殊的机构,政府给予了一些特殊的权力,与政府其他监督部门交往甚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督的效果。

要依法限制经济开发区干部的权力,尤其是要限制一些所谓“高配”的一把手权限,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检查

体系,强化对开发区一把手的权力约束与制衡。

要健全区务公开制度,适度分解权力。在重大事项上实行立项与决策分离,对一些权力比较集中的土地出让、征地拆迁、工程承包等关键业务环节和高风险岗位,按照“事权分离、权力分解、相互制约、规范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有效管理和监控。同时,对领导干部、一把手,要综合利用权力机关监督、党内监督、行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种手段,建立廉政园区。